

# 互联网“翻车”事件生产机制的社会学分析

门 豪

**摘要：**在流量危机的背景下，平台借助于算法的推送机制，放大了网络形象的反差感及荒诞程度，引发了网民去伪存真的联动效应，愈发增强了世俗生活中的道德紧张感。本文以平台流水线式生产的“翻车”事件及社会的反作用为中心，说明作为文化扳道工的网民，从未屈从于平台给定的“颠倒的秩序”，而是对网络文化生产过程中的工具理性化逻辑开展了旷日持久的集体审判，为文化路径的选择及再生产方式积极正名。日常可见的“翻车”事件，呼唤着隐匿在个体内心的文化自觉。研究表明，网络流媒体时代，道德秩序是隐在的，神圣社会从未离开，它会在特定场景下以世俗化抗争等形式出场，并伴随具体的仪式性实践而瞬间释放超越个体的狂热能量。

**关键词：**网络社会 流量竞赛 道德秩序 文化扳道工 文化自觉

## 一、作为网络新现象的“翻车”

关于平台经济活动及平台市场微观运作机制的研究，集中在政治经济学<sup>①</sup>、经济社会学<sup>②</sup>、法学<sup>③</sup>以及新闻传播学<sup>④</sup>等领域，在研究旨趣上大多将平台组织作为分析的核心对象，凸显出现代平台企业在组织规模、组织方式等方面与传统生产方式的差异，强调平台依靠对数据资源的垄断实现强权，影响商品生产与交易的过程，进而可能出现平台凌驾于市场、支配社会偏好的整体趋势<sup>⑤</sup>。

〔作者简介〕 门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社会理论。

江苏南京 210023

〔收稿日期〕 2024-10-10

① Shoshana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Wesley Longhofer, Daniel Winchester eds., *Social Theory Re-Wir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23, pp. 203-213.

② 邵占鹏、甄志宏：《全视监控下网商价格竞争的形塑机制》，《社会学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③ 易继明：《跨境电商知识产权风险的应对——以中国电商在美被诉为例》，《知识产权》2021 年第 1 期。

④ 孙信茹、王偲：《“被看见”的家庭生活：抖音中的家务劳动媒介化与可参观性文化》，《新闻与写作》2023 年第 8 期。

⑤ 门豪：《制造中的集体欢腾：监视资本主义的意义构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3 年第 3 期。

而在文化生产的机制上,由于受制于网络效应的约束,平台文化的繁荣程度只能够借助市场参与者的人数及市场交易规模来进一步确证。<sup>①</sup>换言之,若平台组织之间脱离了流量竞赛,其他任何元素都很难明确地自证其蓬勃的生命力。故而任何与数字不相干的元素只能沦为苍白无力的说辞,流量的比拼成为平台竞争力最有力的证词。而在赤裸裸的流量比拼之外,再也难以寻找到平台及其数字化生产的意义。这样一来,在平台流量锦标赛的紧张环境中,一旦缺失了“投资回报率”等数字化指标,平台便再也不能充分地说明文化繁荣所赖以存在的土壤。

对网络文化生产机制的研究,一般将经济组织方式特别是平台之间的绩效比较作为单一性的切入点,却很少聚焦文化繁荣背后的社会动力机制。在这种逻辑下,已有研究很少能够揭示出组织效率以外的那些基于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的生产逻辑,以至于在理论研究工作中,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空洞,而对互联网文化演变的学理分析亦有不够透彻之嫌。本文以“翻车”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文化扳道工”之于平台经济生产过程的推动力量,以此说明平台并没有从根本上支配文化生产,相反,网民的道德素养与价值诉求极大地改变了网络文化的演进方向。而来自神圣社会的号召及其道德强制力,在网络文化博弈过程中从未缺失。

当前,网络文化空前繁荣,对个体行为与决策的影响巨大。由于文化生产本身与互联网上的各类经济交易活动频繁交织并存在一定的利益叠合,故两者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也相当集中。例如,近年来,直播带货“翻车”事件频繁发生,并为社会大众所熟悉,各类负面性的营销事件更充斥于各大平台的头版头条。具体来说,在直播销售商品的过程中,一方面,许多主播因为不熟悉产品,在带货现场因口误等问题致使场面失控,对商家、消费者、平台等多方权益造成了影响<sup>②</sup>;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主播在网络形象的流量变现过程中,单纯为了追求利润而忽视了商品的质量,有的甚至进行虚假宣传,夸大产品效果,致使售后无门、三无产品横行<sup>③</sup>。总之,商品质量与宣传不符、售后维权难等负面信息层出不穷,消费者对商品品牌方、带货主播团队乃至互联网平台丧失了信任,导致社会舆论发酵。<sup>④</sup>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互联网自媒体潮流的推动下,作为网络流行语的“翻车”的语义外延明显扩大,被曝光的行业秘密及“翻车”现象已愈演愈烈,涉及部分明星、网红等公众人物及其行为,而且其影响力已延伸到较为私密化的日常生活及个人道德等领域。<sup>⑤</sup>总的来看,互联网的“翻车”现象,是指原本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形象,因某种偶然因素的冲击使其形象呈现出前后强烈的反差感,因而引发网民强烈不满、受到社会舆论关注的公共事件。同时,这类事件因具有公共性而与网民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自然会引发社会热议与网民强烈的情绪反弹。

“翻车”意味着由突发性负面事件带来的不良后果及不可控制的局面。一次次“翻车”事件的发生,不仅引爆了网民的激烈情绪,将社会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推向了高潮,表现出互联网时代负面事件固有的爆发性与穿透力,而且这类负面事件往往会对公众的共识与集体认知带来极大的颠覆性乃至破坏性后果,进而可能对社会的公序良俗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那么,应该如何透过“翻车”事件,来分析与定位这样一种负面事件的传播机制及实际后果呢?进一步说,“翻车”事件引发的空前的集体欢腾与情绪化表达,是否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时代症候,并对神圣社会及其道德秩序造成潜在冲击?

①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托马斯·拉姆什:《数据资本时代》,李晓霞、周涛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95页。

② 邹开亮、陈梦如:《直播带货“翻车”事件中主播的赔偿责任》,《宜宾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

③ 李辽:《直播带货翻车谁埋单》,《法人》2024年第4期。

④ 金子昂、徐姐、马相春等:《直播带货“翻车”现象与对策研究》,《传媒论坛》2022年第15期。

⑤ 黎周佳:《流行语“翻车”的多角度考察》,《汉字文化》2024年第5期。

## 二、理论定位：文化扳道工的拨乱反正

文化的传承与实践，植根于一套系统化的符号、传说与仪式，它通常以润物无声的形式发挥影响，但足以向置身其中的行动者提供来自共同体的道德约束与强制力。而反观“翻车”事件的发生，除去平台刻意塑造并放大的速成形象以外，还存在着一种源自社会内生性的道德强制力及其自发动员机制，以约束平台效率逻辑下的流量竞赛，使其符合社会道德的诉求。正如韦伯所言，直接左右着人们行为的不是观念，而是物质与观念的利益。然而，正是“观念”所创造的“世界图像”，常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利益动力驱策下的行动所遵循的轨道。<sup>①</sup>

本文将网民定位为文化扳道工，他们以平台流量竞赛下的“翻车”事件为靶子，并借助于深刻的自我审判，为“空洞的文化生产”正名，以期网络文化生产能够回归正轨，符合社会对公序良俗的期许。进一步说，借助文化扳道工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说明平台效率文化所激励的流量竞赛与网民自发自觉形成的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守护之间，长期存在着现实张力。这种现实张力的表现，就是“翻车”事件背后的平台文化与“正常秩序”两者间的地位竞争。具体来看，平台企业纯粹基于经济绩效出发的流量竞赛，持续性地制造能够激起网民情绪的社会议题，并以此作为平台生命力长盛不衰的利器；而网民对此则表现出了自身的文化自觉，即当平台有意推送的“爆款”文化商品与广大网民自发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发生激烈冲突时，网民便会通过集体审判盛行于平台的众多“翻车”事件的方式来对其即时熄火。进而，从时兴的“翻车”事件与文化内部生发出了一种相互拒斥的社会力量，两种力量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表现出了地位竞争。

长期活跃在网络上的文化扳道工，正是这样一群“铁肩担道义”的非正规职业群体，他们在面临重大的网络公共事件时，往往能够迅速回应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事务，并为大众做出共识性判断与决策提供文化上的引领力量。他们如同在火车岔道上长期值守的扳道工，即时性地更改某一网络文化的行进道路，将其挪动到基于社会共识的轨道上，防止后继车辆大面积“翻车”或“越轨”，确保所有的列车在总体上都能够行驶在安全与正确的道路上。实际上，针对用形形色色的符号与叙事来包装自己、长期高精度表演的网络角色，广大网民很擅长对他们进行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甄别，并在对他们展开集体审判的过程中，获得了日常经济活动所不具备的社会力量。这正是“翻车”事件能够轮番上演的社会文化起源。

在“翻车”事件中，所谓的人设“塌房”，意味着事件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让人大跌眼镜，而与此相关的一连串故事演进逻辑更是令人始料未及。在斑驳、交错的事件发展脉络之中，所有的情节均蛰伏于不自主的、汹涌的情感动员过程中。在日常运转的理性逻辑中，情感与道德秩序支配了正常的行为，但“翻车”事件却开辟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交互空间，其中往往充斥着与理性行为相悖乃至颠倒的社会秩序。面对“翻车”事件，互联网上既存在着因愤恨而被彰显的癫狂情绪，也存在着因某些意见领袖的出现，尝试性地提出具备一定共识性但却充满乌托邦性质的治理方案。最终，网友们通过对“翻车”事件的集体审判，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情感力量，而事件本身所暴露出的不合理性也得以遏止。然而，由于网友们在对整个“翻车”事件的审判过程中，从未通过法律等制度化的方式给出任何理性可及的解决方案，因此究其本质仍只是一种“以暴制暴”。这样，在情绪化表达全面支配了网络传播之际，虽然社会凝聚力空前高涨，但却意味着理性解决方案的不可能性，故而“翻车”也只能在幻影中草草了事。在一次又一次的“翻车”事件中，大众情绪化的表达过程只能陷入一种无限的轮回，其所引致的社会后果也只是情绪化的集体宣泄，而非任何有助于未来相关议题的程式化解决方案。虽然“翻车”是转瞬即逝的情绪宣泄，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车”事件的后续影响

<sup>①</sup> 马克思·韦伯：《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1—263页。



会戛然而止。相反，网友们很可能会因此累积集体行为的经验与智慧，即未来很可能会存在就“翻车”事件的处理形成对法律建设进程等构成影响的共识。

共同体道德往往是日常不可见却又存在着明确的指向性、强制性与爆发力的社会性力量，“翻车”事件为隐性存在的共同体道德的再次出场提供了明确的焦点。在激情引爆的事件酝酿过程中，文化传统能够以“公议”的方式全景再现道德强制力的召回过程，而且该过程的发生又是可以理解的、自然而然的，因此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往往也就没有任何所谓的违和感。在此意义上来看，互联网审判本身根本不是法律等制度化意义上的正式处罚，相反，它是一种在表演式文化情境中的应激反应，即为了应对“大型翻车现场”这种社会破坏力极大、有碍观瞻的人造景观，网友们不得已而为之并随即展开的公开“赎罪仪式”，不过就是公共愤怒的一种寻常展现。<sup>①</sup>因此，网民们团结一致，举起了价值合法性的道德武器，共同“扭转乾坤”，化身为彻头彻尾的集体利益的拥护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共同体的道德价值标准，也就没有实施网络“审判”的有力工具。借助网络“审判”，网民对那些触犯社会共识与挑战社会规则的人，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而“翻车”牵涉的核心人物，则必须接受这种惩罚并“赎罪”，以此维护群体道德的统一性。这样，文化扳道工成为一种象征文化自觉的符号，每个人都试图参与这场集体“审判”的仪式。“翻车”事件固然有伤风化，是负面性、颠覆性的，但社会行动者却恰如其分地借助于内心的文化自觉，将神圣社会牵拉了回来。在此意义上，隐藏在分散个体内心的道德秩序，乃是支持社会行动最为根深蒂固的基础秩序。

### 三、在互联网集体审判中实现文化自觉

当社会共识惨遭“翻车”事件的接连挑战时，社会则悄然地形成了一股抵制的力量。人们将“翻车”事件作为一个焦点或靶子，来宣泄对冲破道德底线的极端偶发案例的反抗情绪，进而表达社会对共同体道德的强烈诉求。下文将对“翻车”事件的生产机制做出具体分析。

#### （一）平台流量危机下的文化速成品

随着平台流量主导下的购物与娱乐方式的日渐普及，各类平台组织逐步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渗透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网络用户数量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日趋增多的新兴网络平台以及不断涌入的新手博主。他们的到来共同引发了一种白热化的竞争局面，加剧了平台组织的流量危机以及主播之间的竞争程度。在面对逐渐稀释的用户密度时，平台与主播都需要通过有效的手段来增加消费者的停留时长，从而获得更多的流量数据，这就迫使他们不停地对存量用户展开争夺流量的博弈。<sup>②</sup>

为了在短期内尽可能地提升流量变现的能力，一方面，不少主播开始借助“网络水军”的力量，人为地制造与控制流量，其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平台加粉、刷阅读量、刷观看量、刷话题榜、刷好评率、刷排行榜等行为<sup>③</sup>；另一方面，平台亦掌控着议程设置的权力<sup>④</sup>，它们利用符合用户心理预期的热搜话题，持续性地操纵用户关注的焦点，强行将用户拉入情感色彩较强或能够加剧群体冲突的认知框架中，使平台能够反复引爆看似中立却易于操纵的社会热点<sup>⑤</sup>，以便为自身输送源源不断的注意力资源，构建起一片繁荣的“网络盛景”。

事实上，部分网络平台尤其擅长利用包括“翻车”事件在内的热点话题，精妙地包装个别负面

① 迟帅：《神圣社会的再生产——基于涂尔干对成年礼的阐述》，《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② 舒越、周立军、杨静：《流量博弈下利益共同体的行为对政企协同治理的影响》，《当代经济》2024年第8期。

③ 韩疆超：《热搜可定制？“网络水军”的危害不可低估》，《工人日报》2024年6月25日，第5版。

④ 张灿灿：《谁来主宰热搜》，《青年记者》2020年第19期。

⑤ 李彪、曹时雨、张瀚文：《平台热搜的“注意力配置”：集体风险认知与媒介化治理》，《传媒观察》2024年第5期。

案例，鼓励网民大胆猜测、步步推理，进而推动焦点的形成，打造力度与范围可控的“爆款”，从而实现流量的增长。为了避免在流量竞赛中“物料枯竭”，部分平台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即通过算法展开对潜在“翻车”事件的流量分发，增加制作“爆款”的总概率，企图长期占据有利的生产位置。在技术层面上，一些唯利是图的网络平台只有不断地营造核心人物、制造热点事件以及炮制离奇般的叙事，才可能在激烈的在线竞争中博得更多关注，立于不败之地。当然，这也契合那些渴望一夜成名的广大创作者群体的期待。无疑，无论是通过正面新闻抑或制造“翻车”事件，登上热搜榜单，都将是他们未来收益能力的最有力的证明。

在流量指挥棒的作用下，部分网络平台对内容生产工作者的动员，遵循着去伦理、去语境的工具理性化的单一逻辑。问题在于，如果一味地强调生产效率的组织化逻辑，那么将会导致内容创作者只能批量化地生产千篇一律、索然无味的“工业品”，而无法真正地打造出一件又一件精美绝伦、难以复刻的“工艺品”。因此，这种以效率最大化为目的的文化生产与组织方式，一方面确实能够化繁为简，大大提升文化创造的速度与活力；另一方面，在平台流量考核的背景下，内容创作者无不全面地被绩效原则支配，拒斥丰满而具体的意义原则，在创作过程中不得已或主动刻意地配合所谓的平台热点和流量趋势。

在平台流量激励下的文化生产，只追求迅速打造“爆款”的工具化逻辑，因此那些不利于收益最大化的任何投入都必须被尽快淘汰，否则将对流量带来致命性打击。这种刻意强调数量比拼、形式化的生产与传播方式，虽然的确可以依靠个别出色的网络角色集中打造出流量蓄水池，但工业化的文化生产逻辑只能使文化产品停留在表面，而无法很好地回应用户真正的需求。正因如此，被算法设定好了的内容生产与推送方式，尽管表面上都获得了很好的传播数据，但内容却空洞无物，以至于经常可以看到网民对于此类现象的负面评论。<sup>①</sup>

在偏离了社会文化再生产规律的互联网空间中，平台总是作为背后的操盘手，以调整算法匹配指令的方式来抵制流量危机，它们辅以并不真实的人物设定，精心策划出一场场玄幻的场景，制造痕迹明显。而网络参与者则从立体的生活世界，被迫走向了逼仄而又充满表演色彩的文化生产空间。原本鲜活、自然与多元的审美旨趣，一时间显得无比黯淡。不过，虽然平台在一味地宣扬流量至上的原则，并将流量作为内容创作者盈利的指挥棒，但平台上内容消费者的审美却是多元的，并非不假思索地被动接受这套给定的逻辑。

在现实情境下，网络人物形象必须要在整个工业化流程中批量地予以生产，以便于平台打造一个又一个绚丽的梦工厂，进而实现宣传效果与经济绩效的最大化。这种造梦工厂能够维系下去的前置性条件在于，观众审美是固定不变的、人物角色是精巧设计的、环境必须是常量的而非变量的。事实上，由于观众亦为网络人物形象生成的一部分，粉丝们通过“打投”等“用爱发电”的集体行动方式，帮助网络人物角色实现了市场价值的最大化。<sup>②</sup> 故而人物形象的情绪变化、与预期效果的偏离乃至背驰，都会影响观众的判断以及潜在的市场收益。此时，人物角色必须始终契合观众的期待。这就要求作为易变的“人”要紧贴其原初设定的人物形象，并且要及时剥离出可能会影响演出效果的众多不匹配、不协调的因素。此时的“人”，必然是高度抽象甚至是以“标签化”的方式存在着的。显然，其中充斥着来自平台等媒介的操控，因为角色本身的不真诚很容易被观众所感知。人物在长期表演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不真实性，乃至漏洞百出，必然意味着其形象已偏离了观众想象的人设与平台预设的叙事结构。网络人物角色会因其前后明显的反差颠覆其整体存在逻辑，暴露出倒置了的日常性秩序，由此留给世人不快的观感。这也就意味着，平台流量竞赛所激励和塑造出的角色形象，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大获成功，但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在“本真”面前是无比脆弱的。在经过大众的连续性以

① 钮迎莹、王方杰、高梦格：《“登上热搜”：关于网络传播评价体系的讨论》，《青年记者》2023年第3期。

② 吴畅畅、顾明敏：《偶像“塌房”与大众文化的精神政治学分析》，《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

及密切的注视以后，所谓的经典形象很可能因表演实践存在的内在冲突性，而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刻意的表演痕迹与行动逻辑上的漏洞。此时，尽管观众仍一如既往地怀揣着较高的角色期待，但在流量逻辑主导下的人物设定，必然会导致其形象在真实与幻相、实在与表演之间来回摇摆，直至观众的心理最终在“期待”与“事实”间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的角色设定以及观众心目中对角色预期的偏差，在残酷的流量竞赛中被一同生产了出来。当人物形象一落千丈之后，观众发现表演背后支持性的舞台、场景与叙事竟然如此地不堪一击，由此很有可能引发观众的愤慨。当然，观众的审美旨趣与文化需求始终是存在的，他们时常因还未来得及深入地审视原有“塌房”角色的形象，却又跟随新一波的流量打造，转而把期待投射到了新的人物形象及新场景之中。这就意味着网络人物形象的生产过程，是反复周折、持续循环的。这是因为“塌房”角色自身前后具备的强烈反差，早晚会因不可控因素的偶然打断而致使其全部表演失败。<sup>①</sup> 在表演性极强的网络角色已经过度偏离了对人性或日常秩序的印象以后，一种内生性的戏谑被无情揭露，也就意味着流量竞赛会放弃失败的人设，而毫不留情地朝向下一个新的角色，继续向观众打造华丽的梦工厂。因而，虽然网络焦点人物是高度流动的，但这套速成的文化生产逻辑却始终未变。

角色在“塌房”之前，由平台塑造出来的形象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但当原本角色设定的条件以及网络形象与观众预期都在即时性改变时，很可能意味着所谓的“造梦工厂”生产出的一切元素，会因未能达到平台流量竞赛的预期效果而被迅速淘汰。伴随着角色营造所必备的支持性元素的退场，网络景观与形象已然发生了剧烈的转换，这就会对人物形象带来不可逆的致命打击。简言之，由于流量下滑而被平台无情抛弃，造成了网络角色的最终破灭。从本质上说，平台为了缓解流量焦虑而周期性地发起“造神”运动，而观众由于移步换景，长期审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翻车”等失范行为，由此引发了非预期性后果，即在无意间将集体精神深度地唤醒了，放大了“翻车”现象的社会影响力。由此来看，平台是“翻车”事件发生所不可化约的基础性条件，然而，它充其量只是潜在引爆点的技术性支持。对文化生产的深入分析还需要回到一套系统化的社会动员过程中去，即要注意社会力量如何被“翻车”事件瞬间鼓动并成为舆论焦点，网友们由此展开对越轨事件的仪式化“审判”，进而才可能说明社会共识生产的动力机制。就此而言，工业流水线打造出的完美形象的瞬时调离，意味着“文化追随者”在被平台操控而不自知的情况下追捧的流光溢彩与技术幻象的落幕。相反，作为一种替代物，“文化自觉者”所引领的新风尚，即从个体自主意识生发出的新的神圣性悄然兴起。

## （二）高度祛魅与简化的日常仪式

与平台支配下工具理性化的生产逻辑大不相同，对普通的网民来说，他们的大量时间消耗在了对个体经济收益毫无用处的“翻车”事件上。在日复一日的生产活动中，人们被生产组织要求的效率逻辑全面支配，社会强制力以“工具理性化”的形式粉墨登场，日渐强大的支配力量保证生产活动长期处于现代社会的舞台中央。在此机制下，个体的日常生活反而会极其单调和乏味，属于集体的神圣时刻所剩无几，人们的心灵无所依归。总之，世俗化的生产生活全面挤压情感、价值等因素，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度紧张，甚至在一段时间难以找到情感共鸣与集体宣泄的出口。一旦当个体身上的神圣性趋于弥散，社会总是要通过周期性的仪式来制造集体欢腾。<sup>②</sup> 引发社会情绪汹涌的“翻车”事件，恰恰充当了将个体从凡俗引向神圣的仪式化中介，一时间将网民的注意力引入舆论的焦点，万众并肩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开启了“星火燎原”式的聚众狂欢。由此，“翻车”成为一种彰显文化强制力的符号，为人们单调乏味的生活提供了一丝缓解精神紧张的调味品。网民更希望能够在一次次高度情绪化

① 理查德·戴尔：《神圣的肉体：电影明星和社会》，米静译，《电影艺术》2009年第6期。

② 宋丹丹、凌鹏：《事神与均惠：从儒家祭礼的两条脉络看中国社会的神圣性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聚集的社会“审判”中获取难得的仪式感。

具体来说，在匿名化的网络围观生态中，“吃瓜”群众怀着“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心态，坚守着刨根问底、追根溯源的“求真”精神，将事件相关的核心人物、外围人群扒了个底朝天。这样，网络情感动员已经完全超越了“翻车”暴露出的表象，而是试图揭示更为根本的问题。人们借由网络喧嚣甚至制造出了本不相干的团团疑云，并试图进一步将其解构，生怕存有一丝一毫的遗漏。总之，喧嚣之中的“翻车”事件，其舆论热度、影响力和波及范围远超事件本身所反映的事实。同时，难以遏制的大众情绪力量也被不断地制造出来。对此，涂尔干有过经典的论述：分散生活时是单调、萎靡和沉闷的，集体欢腾的时刻则充满活力、激情和疯狂，群体聚合之势形成了一股如电的激流，个体的能量像雪崩一样不断增强，所有人的内心都向外敞开，表现出超自然的精神状态。<sup>①</sup>

与传统的集体欢腾并无二致，“翻车”事件与社会情绪的集中爆发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在某种特殊时空条件下的“整装待发”。网络“翻车”事件正是平台创作者添油加醋、借机制造流量的最佳素材。平台自然愿意推波助澜，因为对这类突发的“翻车”事件进行投资，能够在短期内收获最佳的流量实效。众多的平台内容创作者为了迎合围观群众的偏好，不断地试探大众能够接受的底线，并据此不断调整解读事件的视角来借题发挥，甚至从中延伸出明显与事件真相背离但更受大众追捧的另一套叙事。只要在法律及平台治理能够接受的限度内，这些平台内容创作者便可以肆意夹带私货，蹭流量、买热度，虚假营销的衍生性事件更是接连发生。他们以原本的“翻车”事件作为原型，造势的矩阵在短期内被酝酿出来，致使流量一浪盖过一浪，为平台用户的情绪化表达及持续性关注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叙事闭环。当然，不同类型的“翻车”事件所形成的叙事情节是差异化的，故其能够吸引的群体结构自然也各不相同。而越是能够引发社会大众情感共鸣的“翻车”事件就越是容易出圈，也就越能够为平台及其创作者提供盈利的可能。

实际上，任何“翻车”事件都需要被平台“曝光”。不同类型的事件存在着全然不同的“可见度”，而这恰恰是平台有意为之的。即在平台算法即时性的排序控制后，才足以将为社会大众所关注的网络焦点事件的最终效果以指数级的方式放大，进而形成流量不一的焦点事件的地位秩序，使得算法生产、加工以及后续处理的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翻车”事件，并不是经过社会大众的自然筛选就能够形成的。平台会依据“翻车”事件的潜在影响力而设定不同的曝光度，进而又会引致不同等级的流量结果。当然，平台只会推送那些更容易被网民所关注的焦点，这会使得平台的推动更加富有价值，以此为平台带来更为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不经意间通过“翻车”感受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共识建设的方式，又蛰伏于极其强调工具理性化的生产逻辑之中。

在由各种网络事件构筑起来的流量竞赛中，平台纷纷发动极为激烈的地位竞争，而每一次“翻车”事件都可被视为平台响亮的“冲锋号”。进一步说，每次“翻车”事件都是一次博得大众眼球的最佳契机，平台不但不会打击这些对社会规范构成潜在威胁的事件，相反他们会积极、巧妙地利用这些焦点事件所能够激发的巨大社会能量，将其作为引领舆论话题与社会风尚的工具。换句话说，平台试图在“翻车”事件中形塑出在平台控制下的给定社会秩序。而隐藏在这种被形塑的平台秩序中的对象，既可以是经济驱动力，也可以是社会价值观，但多数情况下，两者往往相互交织、难以割裂。这就使得平台不再停留在经济与文化生产的简单维度，而是借助庞大的算法机器，对社会构成全面影响的支配权力。而这种权力足以即时性产出任何可能的社会后果。而普罗大众对此却深陷其中而不能自知。

平台通过流量竞赛不断地调动庞杂的商业信息系统，加注于全方面的广告元素，并且以配合人物形象为目的设定玄幻的场景与叙事，制造出冲突感与宣传的噱头来吸引眼球，以此设定观众头脑中想象出的人物形象。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却又因观众的审美疲劳和不断更新的场

<sup>①</sup>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96—297页。

景期待而遭受边际营收的下滑，故平台必须再次启动营收核算，打造出更加符合当前观众期待的全新人设。换言之，平台不破不立，它们不得不因激烈的流量较量舍弃那些表现不佳的人设。至此，“翻车”事件落下帷幕，原本肩负重担的角色形象轰然倒塌。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非现实场景中，平台达到了攫取利润的最终目的。

平台为了流量最大化地营造目标，一切元素必须朝向观众期许。这样，娱乐大众与操控舆论的效果相互叠加，把原本附着于人设自身的真实形象完全抹杀掉了。甚至为了实现流量最大化，平台及其所有相关的获利者，不论角色本身所蕴藏的元素充斥着多少矛盾、戏谑与反逻辑，在“打造人设”的流量运动上达成了一种空前的默契。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平台确实能够持续制造出“爆款”。焦点人物形象的迭代原则恰恰符合了观众心理的诉求，所谓“一代更比一代强”。虽然部分元素难以自圆其说，甚至有悖常识，但借助无比玄幻、同义反复的叙事，便足以印证人物形象的圣洁，以至于除非网友能够找到致命性的缺陷，否则普通人很难对此提出任何质疑。

一言以蔽之，平台通过流量最大化来赢得网民的关注。最不能够遗漏的是那些登上热搜榜的大型网络“翻车”事件——在用户与流量蜂拥而至时，平台也就达到了最想要的经济效果。此时，个体在感知强大的经济与社会力量的同时，又成为主动融入其中的一分子。总之，在“塌房”人物轮番上阵、“翻车”事件频频上演的过程中，平台算法、内容创作者以及全体网民完成了高密度的仪式化作业。如同重大节假日所必备的嘉年华一样，在对“翻车”事件的集体“审判”中，网民们在网络中实现了瞬时狂欢，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仪式。较之于传统仪式来说，“翻车”事件所形成的联动效应及社会参与感虽然丝毫不减，但瞬时狂欢发生的周期更短，所必需的道具准备、前期资源积累和对应的仪式性动作均极尽简约，耗费的社会时间与能量更是应省则省。事实上，情绪的共鸣与发泄很多情况下只需要借助于在线围观、评论和弹幕等形式即可完成。对大多数人来说，一旦所谓的在线仪式性展演一扫而过后，留下的充其量就是一些短暂而无关痛痒的集体记忆。因此，这样的仪式展演就显得颇为世俗化，大有敷衍了事和未能尽兴之感，其形成的社会团结效果也远远低于经过烦冗而漫长准备的传统仪式所能够带来的震撼性程度。

就此来说，“翻车”事件的材料加工、仪式性表达与情绪化的消耗过程，完全不能与传统仪式相提并论，这种现代化的在线围观仪式既不会周期分明，又因利益机制与情感动员完全混杂在一起，已不能分清功利性的资源储备与纯粹仪式性动作的明确边界。换句话说，没有人愿意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仅图一时爽快而非理性地投入“吃瓜”的盛宴，进而深刻感受情感迸发那一刻共同体的短暂力量，并因此臣服于社会强制力。相反，出于投入和回报的考虑，在面对网络聚集事件时，绝大多数网民都是相对克制和理性的。即是说，网民既不愿意放弃感受“翻车”事件中蕴藏的社会力量与全民参与的激情，同时也要争取最低成本地围观，而非长期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这样就造成了面对客观的“翻车”事件时，大众更多只是顺水推舟，而不可能毫无顾忌地放下手头工作，转而全身心地投入神圣社会的共同建设。

也正因此，“翻车”事件真正的遗憾之处在于其华丽表象的背后是如此的机械与功利，缺乏深度的情感沟通与社会穿透力。个体试图利用网络来寻找暂时的心灵慰藉，进入所谓的在线集体欢腾，这充其量不过是在平台刻意的人设营造与流量竞赛的过程中，一种流于表面、缺乏真诚和无比空洞的骤然遭遇。观众在抵达了焦点事务的内里以后，竟然发现梦幻场景的创建不过尔尔，网友们高涨的热情因形象的强烈冲突与巨大的反差感而节节败退。人们终究感知到了，从周而复始的日常生产劳动进入不为世俗他者所打扰的网络精神世界，只不过是世俗化的另一套幌子。这样，移步换景的努力非但没有获得成功，反而只能够被更加新颖、更加绚丽、更加虚幻的网络场景所继续吸引。

总之，空洞的网络形象不仅因意义感的缺失而使得表演过于轻浮，而且始终无法为社会大众提供心灵的皈依。因此，人们想要重新找回共同体的道德强制力，只能够寄希望于对心灵道路的自我审判。“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只有个体内心丰盈，才足以承载起沉甸甸的文化重任。进一步说，



“翻车”事件的生产，在于社会行动者的文化自觉，个体有意融入集体的背后存在着基本的价值诉求，即找寻神圣社会。虽然重复性的日常表演仍旧停留在片刻的欢愉，无法满足唤起共同记忆的期许，但巧借网络“翻车”事件之名，确实可以达成空前的民意聚合之目的，进而为分散的社会个体提供短暂寄居和心灵慰藉的住所，以期能够共同找回内心深处的敬畏。建构神圣社会的美好愿景，得以被一种再简单不过的世俗化实践而彰显。

### （三）神圣社会的世俗化回归

作为通用技术应用的互联网，未曾提供一份统一的行动指南，来引导每个社会参与者如何使用它。然而，当互联网的普及率越来越高时，用户在互联网传播媒介上游荡的时间就越多。他们无意于直接获得任何经济利益，而是将大把的时间耗费在逛贴吧、刷朋友圈、刷微博、发弹幕等看似无目的性的行为上。事实上，网民纷纷游荡在网络空间中刷存在感、获得仪式感，并非对个体生命时间的无谓消耗，而是一种下意识的、日常性社会参与的方式。网友不过是借助于围观、参与“翻车”事件“审判”这类世俗化的活动方式，来找回个体在社会中的恰切位置。这也正是广大互联网用户群体在网络社会中颇为独特的一种团结形式。

当全民的媒介化使用与透明化生产形成一股潮流，“翻车”事件越是常见，其影响力也就越发容易形成“破圈”的传播风暴。其深层原因在于刨根究底的网民心理，以及附着于其上的为集体道德共同辩护的狂热情绪。具体来说，关乎己身的“翻车”事件正如一面面镜子，反射出自己可能不存在不敬畏社会、不遵守规则、不符合规范等诸多问题。以“翻车”作为负面展演形式，为重构公序良俗、匡扶社会正义的渴望提供了有力的世俗化的仪式基础。

当制度建设在完善过程中仍旧存在漏洞、人情关系社会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人性因遭遇无端变故而呈现重大扭曲之际，相比于“翻车”事件及其动因本身，我们在理论上应当更加关注其“补充性”的社会效果。即复杂的社会系统可能在演化过程中暴露出各种问题，但这些细枝末节的“越轨”行为，又是法律等刚性社会制度在短时间内难以观照、修正和杜绝的。“翻车”事件所聚集的庞大社会能量，虽然并不清楚其从何处呼啸而至，然而它却能够在精神与观念的层面上为暂时性的反常秩序和例外情境提供及时性的补救措施。正是汹涌的民意集中捣毁了积压的负面能量，呼唤着神圣社会的本来面貌。换句话说，集中爆发的社会情绪正在尽可能地快速威慑那些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做法，抵御负面事件对人的心性所构成的潜在侵害。“翻车”事件恰恰触动了丰富、敏感而富于弹性的社会神经元体系，实现了短暂的情绪化反弹，缓解了极端案例对社会秩序的冲击，社会的道德秩序最终以软着陆的方式得以保全。这种疗愈社会的效果恰恰是刚性的法律制度所不具备的。

涂尔干曾指出，神圣性来自群体的欢腾时刻，它构成了道德变迁和社会重组的源头，而社会学的任务正是追寻神圣社会，通过这些制度性框架来把握欢腾背后的社会意识。<sup>①</sup>在互联网场景下，神圣社会及其道德秩序的生成，集中表现为围观的大众特别是“网络判官们”，在共同指向对“翻车”事件公开“审判”的“网络执法时间”，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狂热心理状态。只不过网民们的情绪很难恒久，那种类似于宗教性质的狂热，也只能借助于此时此地对“翻车”事件共同“审判”的心理状态而彰显。事实上，对“翻车”事件的集体审判与狂欢本身即是一种超乎平常的状态，是全体网民委身于社会力量的心灵升华。因此，人们对“翻车”事件的仪式性参与，其目的并不在于使神圣性常伴在侧，而是企图通过日常世俗化的实践，在集体找回共识的短暂过程中彼此确证曾一度疏离的道德秩序的归来。而在大众感受到了神圣力量的现实存在以后，它又转瞬即逝了。

在“翻车”事件的生产过程中，人们暂时性地搁置了单调、枯燥与重复性的经济活动，主动选择融入另一套秩序结构，并通过在线集体行动对隐藏在“颠倒的秩序”中的文化生产与组织方式进行抗议，呼吁不应放大个别偶发事件的社会影响力，借此杜绝以打破共识、冲击底线的方式来吸引流

<sup>①</sup> 曹金羽：《神圣社会的谱系：从涂尔干到社会学学院》，《社会》2024年第2期。

量、促进平台经济的增长。由此，平台、网民以及与“翻车”事件关联的核心人物共同完成了角力，进而将互联网呈现出的亢奋乃至癫狂的状态迅速拉回正轨。这样，社会穿梭于“神圣”与“世俗”之间，道德秩序实现了再生产，人们在一次次高度浓缩的网络情绪中感受到了社会爆发性的激情与凝聚力。

当然，伴随着经济增长与社会生活的巨大分化，网络共同体的力量并非铁板一块，在文化共识中也存有细分甚至是彼此对立的亚文化，这意味着扳道工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一股力量。在针对“翻车”事件的道德审判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可能存在着不小的角力。然而，由于“翻车”事件激发的社会情感迸发，致使参与者暂时搁置手头事务转而进行仪式化的讨论，其前提莫过于社会性共识的出场，这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排除了那些未曾具备共识而无法精准定义的公共事件。故而，该类由不同亚文化冲突所引发的网络围观，或互联网吃瓜现象<sup>①</sup>，应另作其他类型处理，亦非本文探讨的重点。在此有必要强调，由于激情的发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套完整而统一性的价值观支持系统，故而文化扳道工在面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方向上始终是一致性的、强制性的。如果因若干缘由网民的激情逐渐褪去，转而将“翻车”事件进一步地推进，即为理性协商、法律实践等专业技术的手段所驯服，则意味着在利益与价值观的博弈过程中已经求得了广泛共识。当然，这已然超出了文化扳道工的使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化扳道工无意于塑造共识，更不愿意改变文化传统，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以下意识的文化传统、社会共识为前提的。

综上，“翻车”这种看似变态的文化情境，实则刺激到了最深层的社会神经并引起了集体性的强烈反弹，大众对共同体道德秩序的呼声空前高涨，神圣社会呼之欲出。而大众对“翻车”事件的共同“审判”，正是赋予社会神圣性的时刻，即神圣社会的生产过程是从世俗通往神圣的全体努力。问题在于，越是想象已经借助网络进入了无边的文化大观，抵达了一个尚未受到世俗所约制的空灵世界，当“真实”逼近时人们越可能大失所望。即是说，由于误以为网络文化生产是自主性的，遵从着一套自由意志与观念决定的逻辑，以至于不会被世俗化的工业生产方式染指，然而在过多的“塌房”与“翻车”事件中，网友们看清了这套与工厂流水线作业并无二致的网络文化生产的逻辑。当这套文化生产的本来面目被网民识破之时，便意味着在网络中享受到的一切崇高礼遇、一切共同体的仪式与广泛参与的膜拜，将因这种内生的表演性而大打折扣。

与大众预期相差甚远、与真实世界亦不契合的网络文化生产，卷入了一种刻意制造神圣大观而瞬间又被世俗俘获的循环机制。苦心营造的空灵世界及其若干图像符号、人物形象、仪式与叙事，终将被肆意、浓重的商业化过程破坏。而实际情况是，所有的元素因缘际会，演员与观众共同抵达了舞台，一切不明所以的缘由交织，让观众抵达了想象的彼岸。然而，由于普罗大众已经设定了过高的期许，其朝圣般的心灵在进入纷繁的网络世界而被工业速成品完全包裹时，却骤然发现诸多的网络形象与前期的角色设定明显不符。一个个追求神圣的个体与早已祛魅的互联网世界显得格格不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制造梦幻场景而又被反复刺破的过程中，演员表演越是投入、形象打造越是奢华、观众情绪越是高涨，伴随着平台流量高潮的共同抵达，必然会转向另外一场更大的欢愉，以此掩饰内心的空虚。然而，原有人造场景共同幻灭的过程就会显得愈加悲凉。通过“翻车”带来的仪式感与社会融入，其最终归宿无不是一场场空欢喜。当道德秩序被无尽的日常表演所淹没，再多的仪式性符号只能为恢宏场景充当玄妙的修饰，却无法掩盖其虚空的内里。当现代个体丧失了源自内心的信仰时，看似华丽的角色设定，只可能在绩效合法性的大旗下沦为一场又一场的同质表演，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现代高速运转的机器系统的强力作用下，平台虽然能够获得强权控制力量，但究其实质，不过是被效率逻辑

<sup>①</sup> 门豪：《互联网“吃瓜”的意义构成——集体欢腾新面孔》，《天府新论》2022年第1期。

所命中的昙花一现。一切社会元素无不被这种以绩效为目的的表演所裹挟，任何行动者终究不可能脱离工具理性的基础逻辑。人们在对神圣社会的想象之余，便也只能以世俗化的仪式来觅得暂时歇脚的一方天地。

#### 四、结 语

百年以前，反常、病态和失范现象在世界频频发生，社会规范根本无力实现团结。<sup>①</sup>这对身处转型年代的社会学家涂尔干的思想历程构成了重大影响，他也由此建构起了一套位于圣俗之间的社会整合理论。他认为，文明随着进步而持续增长，社会结构的紧张感亦有所增加，不过这不但不会危及文明，反而正是现代社会的可能性所在。这是由于当个体每一次“照看自我”之时，看似“退隐”的社会都在其灵魂深处悄悄降临。<sup>②</sup>而再进一步说，人性的宗教的理性的表现形式，即是个人主义道德。<sup>③</sup>

本文认为，社会自为一体，善恶分属两端，负面性的符号、仪式与叙事唤醒了共识与正常的价值观。网络“翻车”事件呈现出人们试图在颠倒的秩序中理解正常秩序本身，并在讨论中推动新共识的形成。这正是个人观照自我主义道德的一个契机，也是“翻车”事件引发全社会热议的动力机制。事实上，网络“翻车”事件是身边真实可感的日常生活案例，它不仅调和了平常生产活动中的单调性，补充了抽象社会固有的虚无感，而且在短暂而激情的“审判”活动中获得了社会强制力的加持，人们犹如重获一个新的灵魂，涤荡了心灵。于是，人们开始偏好这种以世俗化形式抵达神圣社会的方式，甚至暂停了重复性的生产劳动，享受着神圣社会提供给个体心灵的自在时光。

经济意义上的流量秩序，植根于社会共同体的道德诉求。流量大小关乎平台与内容创作者的收益，但在网络洪流、信息过载的状态下，人们并不是只能接触到“翻车”事件，而是“翻车”事件更容易引发社会大众的关注、讨论与热议。甚至不乏由于“翻车”事件而“一朝成名天下知”，获得巨大的流量收益的案例。实际上，基于共同体道德强制力的社会共识，是“翻车”事件经久不衰乃至形成网络亚文化的基础。人们希望通过围观“翻车”事件、即时性表达对“翻车”事件的意见，呼唤文化自觉，重返公序良俗所框定的精神家园。

总的来说，网络文化的自主性始终存在，网民坚守的传统文化观念虽然可能暂时性地被“翻车”事件所扰动而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也因此引发了全社会对“颠倒的秩序”的共同“审判”。经此一役，不仅被长期搁置的文化传统实现了复归，并且神圣社会反而被短暂召回。以“翻车”事件作为共同的“敌人”，新的社会团结以在线“审判”过程中形成共识的方式出现了，道德凝聚力反而空前膨胀。故而任何以鼓动社会情绪、喧嚣与焦躁的网络引流手段，反而在社会凝聚以及网民情绪化表达的过程中，为个体应如何应对当前不确定性的重大问题，重新找回了由道德秩序所加持的内心宁静感。至此，强大的文化传统得到了现实观照，亦未被经济效率取向的流量竞争规则所改写。

无论如何，网络时代的确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的新症候，无处不在的“翻车”事件似乎主宰并笼罩着整个互联网文化生活。但究其根本，与“翻车”事件相伴而生的不确定性不过是一种被流量焦虑及精神躁动所包裹的表面隐忧。倘若要真正辨识“翻车”事件的本质，还需要回到文化扳道工及其内心固有的道德秩序上去，而这也正反映出神圣社会在世俗化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责任编辑：袁捷）

①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2版，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4页。

② 孙帅：《神圣社会下的现代人——论涂尔干思想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

③ 爱弥尔·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汲喆、付德根、渠东译，渠东、梅非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